

穿梭大圍村歷史／文化空間 — 專訪大圍村前村代表鄭水興先生

訪問 / 張秋玉、李嘉言、楊美儀、朱純儀

2007年的聖誕前夕，城市內熱鬧如昔，滿街張燈結綵的裝飾及購物人潮。但對沙田大圍村村民而言，這日子跟任何日子也不一樣，那是村民舉辦每十年一度的太平清醮活動。12月24日的早上，在打醮會場內，眾位穿著長衫馬褂的鄉親父老穿插其中，我們看到一位身材魁梧、一頭銀髮的會長，忙著招呼到來的親友和村民，這位父老便是鄭水興先生，正是這次人物專訪的主角。

鄭水興先生（以下稱鄭伯）今年已七十七歲，膝下有七女一子，十六名內外孫，一名玄孫，共廿五位家族成員，子孫滿堂。鄭伯的家族在四百多年前已定居大圍村（原名大瀝源村，後又名積存圍）。除了有兩年赴英國任廚師外，鄭伯一生都住在大圍村，也曾連續三屆當上共十二年的大圍村村代表。

大圍村已有四百多年歷史，是沙田歷史最悠久及規模最大的圍村。大圍村是一條多姓村，由原來十九姓，演變到現在只有十四姓原住民的聚居之地。目前村內以韋姓為最大族並設有祠堂，而大圍村現今仍住了大約三百戶原住民家庭，共約一千一百多名村民。

村落佈局顯出傳統智慧

世事變化，白雲蒼狗。縱然圍村的外觀可能早已變得模糊，其格局仍能窺見傳統智慧，也能靠如鄭伯的上一代人往記憶裡搜尋，讓回憶歷久常新。鄭伯帶我們參觀大圍村，沿途的男女老少都會向鄭伯問好，鄭伯則一路回憶起往事。他走到一個門牌前停下來說：「這裡每一條巷，每一間屋的編號都是我十多年前制定。以前村內沒有巷名，郵差派信著實不方便，村外人來訪也易迷路。我便把巷編為一

到十街，每間屋給了編號，這制度很實用。」鄭伯對村內一草一木，一磚一瓦都瞭如指掌，甚至大部份的原住民的名字，仍可以唸出來。

面對早已滄海桑田的大圍村外圍，鄭伯憶述，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大圍村是沒有城牆的，但村外圍是由一排排村屋和幾個圍斗(又名瞭望台) 組成，積信街與積存街之間的圍斗外是一個公家魚塘，魚塘內飼養了生魚、塘虱、鯉魚等。魚塘以外便是耕種的農地。鄭伯感嘆道：「由於生活困難，幾戶人家才能合力飼養幾頭豬。當時，衛生條件差，飼養的牲畜也與村民一同住在屋內。村民日常只吃一點蔬菜，要到大時節才有機會吃到自己飼養的豬和雞。」

「以前的村屋是用石和青磚砌成，牆身特厚，窗戶特小。圍斗是用來防禦當年的海盜，村內狹窄小巷縱橫交錯，鄰舍關係也很好，弄巷的窄小設計同時也方便遇到有陌生人闖入圍村，只要村民一聲令下，便能一呼百應，其他村民隨即便合力把可疑人物重重包圍。」鄭伯雖嚴肅凜凜，卻不難感受到他對村民守望相助之深厚感情，引而為傲。

「1962年颱風溫黛吹襲下，沙田發大水，很多人傷亡。有一戶王姓家庭的木屋被大風雨摧毀，一家人捧著一條杉木漂流到大圍。我和村民救了這家人，還安置他們一家住在韋氏祠堂直到政府安置。往後每年春節，那家人都來多謝我。那次很多人的家園被毀，當時很多香港人都把財物放在首飾箱內。我見到一個個首飾箱漂浮在海上，大家都沒理會只一心救人。」鄭伯表示那是大圍村最有意義的一件事。

少年回憶 野外童年往事

圍村總予人封閉，被圍困、隔絕的感覺，可是在鄭伯的回憶裡，童年生活自由自

在，充滿歡樂。當提起以往的少年事，鄭伯便顯得興致勃勃；一起與朋結伴去「聊」（圍頭話，即玩），上山捉豹虎（亦即金絲貓），下海捉游魚，到野外踢足球。鄭伯尤其懷念少年時在村公所青年會成長的那段日子。「那時青年會主辦很多戶外活動，當時的青少年很團結，守望相助。我在十四歲那年便替村裡煮過四十多圍酒菜。若果知道有老人家正彌留，大夥兒便不分你我為老人家準備後事。」這習俗對比現在現代人臨終時往往都要到陌生的，而且冷冰冰的白色醫院渡過人生最後一刻大相徑庭。「以前老人家臨危，大家會到他/她家待在其身旁，送他/她最後一程。年青的會為老人家掘好墓地，準備身後事和煮解慰酒（負責煮解慰酒的，人稱「大力」。所有村裡大節日的傳統活動和禮儀等，都是在青年會幫手時學來，這樣一來便可以薪火相傳。」他每每強調沒有人可以刪改歷史與傳統，而保存與承傳的最佳方法就是親身參與村內的活動。他回憶年少時在青年會為大家做事，但初時對傳統習俗禮教一竅不通，又沒有文字紀錄作參考，那最好也是唯一的方法便是謙虛的向鄉親父老請教。「虛心請教，他們會一五一十告訴我們，我們則邊學邊做。傳統習俗自然可按原本存留下來。」

鄭伯一臉無奈說到現在青年會已今非昔比，年輕一代只會在青年會打麻將、上網，要不就留在家中打機。現在青年會再沒舉辦太多活動，傳統活動的承傳便後繼乏人。鄭伯舉例說，今屆打醮由年青一輩自行安排，但卻沒人走來向鄭伯請教過甚麼，因此很多禮教細節也忽略了，這些習俗也會漸漸消失。

「傳統上，大圍村的太平清醮應在農曆十月進行，是因為我們的村民在十月收割完稻田，才有空地可用作太平清醮各項儀式，以謝神恩與祈求全村來年平安。祭禮是祖先按四時而挑選恰當時間舉行，其中當然有其意義。但現今新一代只顧其他不重要的理由，如避免與區議會的投票日相撞這些政治因素。傳統和歷史是不能改的」。作息有時，對好些村民，尤其年長一輩的仍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他們相信這與全村上下老少的平安很有關係。今天愛在電腦聊天室「聊」的年青一輩，

在打醮當天都很投入參加，但是還有多少會有興趣知道節日背後的意義？

時間、空間的角力

永不磨滅的記憶毋須刻意記着，但在特定場合或空間，便會忽然在腦海裡呈現。我們來到牌坊口，鄭伯繼續說：「四、五十年代，村口有一口水井，井邊有一棵櫻桃樹。每天清早，村內婦女都會聚集在那口井附近，忙著打水，為一天工作準備。接著她們會各自挑著盛滿水的水桶，到自己的農田開始一天辛勞的耕種。那段日子生活艱苦，農田和家務都留給婦女去打理。男村民就到外面找工作，當時也有不少男村民會到海外『行船』，或在唐人街當密集式體力勞動的工作。因為生活，我也曾到英國幹了兩年廚師工作。每天黃昏過後，外出工作的男村民都會聚集到那口井附近談天說地，分享見聞。」



六、七十年後的今天，村口那口水井早在 1967 年因乾涸而被封閉，改建了村口一座牌樓，附近還建了一個休憩小花園。今天再看不見打水的村婦和「吹水」的男村民聚集。晚飯過後，村內的孩子會聚在那兒「聊」（圍頭話，即玩），另一邊廂，三五成群的印傭會在休憩小花園聚集閒聊。鄭伯說因為附近有一戶租了給一個印傭聯誼會，所以休憩小花園便變了她們傾訴離鄉別



井的地點。男村民的聚腳地也由原來村口水井，遷往村內侯王宮前一塊空地上。那裡放了一些膠櫈，每晚飯後或週末都會有一班中、老年男村民聚在一起談論天下事、賽馬等等。



鄭伯可能不懂什麼是「空間實踐」、「公共空間」這些詞彙，但在他口裡說著的，心裡記著的，都是為村民、甚至是非村民謀福祉的故事。在村外圍，積信街與積存街交界從前是圍斗，政府早已將之改建成公共行人道。圍斗對出的魚塘亦早被填平變成一條馬路和一幢幢幾層高的樓房。幾位有心的居民從附近一所已結業的老人院舍搬來的十數塑膠櫈，整齊排列擺放在幾棵小樹下，給村外路過的老街坊休息閒坐。鄭伯有點無奈說：「本來我已向政府申請在那裡建造一張有棋盤的水泥枱和兩排水泥櫈，後來不知誰從中反對，計劃便擱置了。我也就是想方便街坊啫！」問鄭伯為何那幾張膠櫈總會有些中、老年男人坐著。「哎呀，看美女和賭馬啊！附近有一間馬會投注站嘛！」鄭伯笑說。再問鄭伯為何不見女村民聚集？「她們不是煮飯，便在家打麻雀。」

失傳遺憾

對於一些失傳的物件，鄭伯總是耿耿於懷。很多年前，侯王宮內的老廟祝和村內的一些長者糊里糊塗把一些舊物件賣掉或丟掉了，如祭祀用的祭帳，幾把大羅傘

和一張酸枝木造的貴妃床，就令他氣憤。鄭伯最遺憾的還是他自己手抄了一份大圍村的掌故寶典，裡面記錄了一個個發生在村中的故事，一套套節日的禮儀、一款款傳統菜式的細節（如怎樣烹煮大煎堆、完農、雜糍等），就因幾年前一位大學教授的人借走了寶典研究，之後便一直沒再出現，寶典也失傳。現在，鄭伯就像大圍村的一本活歷史書。對於大圍村，鄭伯經常有句話掛在嘴邊：「我只是想為村民做點事，幫到那些百年歸老的原住民爭取到應得的，能在我們的土地安葬罷了！」

訪問後感

鄭伯因為「失傳的遺憾」而耿耿於懷，但他自己其實就已經是「傳統」的一部份。在班雅明的歷史觀中，傳統之所以能夠流傳下去並非單純用文字記載，而是有賴於聽故事的人將歷史記著，再以說故事的方式傳給他者。正如鄭伯能夠將傳統成為個人記憶，是由於自身的體驗跟歷史互相吻合，當遇上我們的訪問時，便能在一個合適的環境下，將沉澱了的記憶從生活裡帶出來，不需要刻意記著，亦不存機心。正是由於鄭伯加上了個人的體驗，從鄭伯口中聽到的故事亦會變得更加豐富和吸引，這正是傳統的可貴之處不就是歷久常新。但有點可惜的是，聽者約是村內居民，而不只是訪問者，那便更有意思了。